

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 及产生原因^{*}

黄 明 光

《国榷》系明末清初人谈迁所编撰,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编年体史书。谈氏认为当时各家所撰编年史书,多忌讳失实,讹误肤冗,拘忌文法;桎枝耳目,荒诞甚多;见解肤浅,遗害不凡。于是自己广搜博采,拾遗弥阙,参以己论,摭格成编。又自以为对“事辞道法”,都经过“句榷而字衡”,故名其书为“国榷”。今人评是书褒词颇多,赞扬备至。我国明史专家吴晗对其史料价值评价颇高。但笔者近期参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中国历代登科录》的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将《国榷》中有关科举进士的史料已全部抄写成卡片,耗时一年,发现其中讹误不少。现把有关进士官员的史料谬误之处,归类疏举如下(限于篇幅,每类仅列两例),望受教于同仁。

一、《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讹误之类型

(一)一人两述,重复赘载

谈氏在《国榷》序文中批评前代编年史书时云:“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主张行文不应冗赘。今人评价此书,也认为记事述人字精句简是《国榷》的一大特点。但笔者检阅

^{*}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 2003 年立项项目。

全书中有关进士的史料,发现有少量一人一事两述,重复记载的赘文。例如:

(1)前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聂豹卒,永丰人。正德丁丑进士……赠少保,谥贞襄。^①

前兵部尚书聂豹卒,永丰人。正德丁丑进士。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②

案:上述明显一事两书,重复赘述。关于此人卒年,明徐阶《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贞襄聂公豹墓志铭》文云:“(聂豹)字文蔚,正德丁丑进士。始知华亭,拜御史。巡抚福建……公生成化丁未(1487)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亥(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七。”^③又见《明史·聂豹传》文称:“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华亭知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三十一年召翁成达为兵部尚书,未至,卒。以豹代之……归数年卒,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④再,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2太子太保条文“聂豹,江西永丰人,嘉靖三十三年以太子少傅、兵部尚书进加,寻致仕。”^⑤

据上述史料,进士聂豹去世时间应为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其被朝廷赠少保,谥号贞襄一事当在隆庆年间,故上引《国榷》第2条为赘语重复,当删省。

(2)巡抚广西右副都御史张任卒,任字□□,嘉定人,嘉靖丁未进士,赠兵部左侍郎。^⑥

巡抚广西右副都御史张任卒,任字□□,嘉定人,嘉靖丁未进士,素清谨,在粤有平妖功,时三品未满,特赠兵部左侍郎。^⑦

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张氏系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二甲五十四名进士,直隶嘉定人^⑧。关于张氏官任广西巡抚的时间,清金鉉《广西通志》卷68“明代名宦志”称:“张任,字希甲,嘉定人。万历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其去世时间

应在万历八年,张氏去世的直接史料,笔者未见,但可以用广西巡抚郭应聘上任时间佐证。郭氏任广西巡抚的时间,先见《神宗实录》卷104“万历八年九月辛未”条:“改任户部右侍郎郭应聘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又,谢启昆《广西通志》卷31“明代万历朝巡抚表”载:“郭应聘(万历)三年在巡抚任,进兵部左侍郎,万历八年起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又,清金鉷《广西通志》卷53“广西明代巡抚职官表”称:“郭应聘,隆庆五年任,万历八年再任。”^⑨又,《明史·郭应聘传》文称:“万历二年召为户部右侍郎,寻以忧归。八年起改兵部,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⑩据上述史料,郭应聘任广西巡抚时间应在万历八年。

据上述史料,张任去世时间应为万历八年,而被“赠兵部左侍郎”时间当在万历九年。《国榷》将“赠兵部左侍郎”一事两载,重复,当删省。

(二)中式时间,误载年代

笔者见《国榷》中记录进士官员考中科举的年代,笔误之处颇多。究其原因,有两种情况:其一,误将会试年代书作殿试年代。依明代科举制度,会试中式一律称贡士,殿试中式方称进士。虽然民间有把考中会试者亦称作“进士”,但严格而论,两者考中的年代不可鱼目混杂;其二,明代纪年用天干地支,这容易造成两类情况的讹误。第一是把天干地支前的皇帝年号弄混淆,如四川中江县徐英,考中天顺丁丑年进士,却被《国榷》书作“景泰丁丑年”进士;直隶鄞县人余本,考中正德辛未进士,却讹为“弘治”辛未进士。第二是天干地支文字形状上的形误,例如:“乙未”与“乙丑”、“乙丑”与“己丑”、“丁未”与“乙未”、“庚辰”与“甲辰”、“辛未”与“丁未”、“己未”与“乙未”,等等。由于《国榷》在1958年前均为手抄本,这些字体形近的字往往容易相互抄写讹谬。

(1)前少保刑部尚书闵珪卒,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癸未进

士,授御史。^⑪

案:上文书闵珪为“天顺癸未进士”有误。依明代科举制度,天顺年间只有天顺元年(丁丑,1457)、四年(庚辰,1460)、八年(甲申,1464)三次会试,而天顺癸未年为七年(1463)并无会试。故“癸未进士”必误矣。先稽明人资料:

其一,《武宗实录》卷80“正德六年十月庚寅”条记作:“致仕少保刑部尚书闵珪卒,珪字朝瑛,浙江乌程县人,天顺甲申进士。”^⑫

其二,明王鏊《太保谥庄懿闵公珪墓志铭》文云:“闵公讳珪,字朝瑛,天顺甲申登进士,选授山东道监察御史。”^⑬

其三,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50“刑部尚书表”中载:“闵珪,浙江乌程人,天顺甲申进士,弘治十三年任,正德二年致仕。”^⑭

清人史料:清嵇曾筠《浙江通志》卷131“天顺八年甲申彭教榜进士表”:“闵珪,乌程人,少保,刑部尚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闵珪,浙江乌程人,天顺 8 / 2 / 26。”^⑮据上述各种史料,闵珪应为天顺八年(甲申,1464)进士。另检《国榷》卷首之四“刑部尚书表”载:“乌程闵珪,天顺甲申进士,五月任,辛未十月卒。”^⑯证同书“天顺癸未进士”之误。

(2)前南京工部尚书陈雍卒。雍余姚人。成化庚辰进士。授工部主事。^⑰

案:《国榷》记陈雍为“成化庚辰进士”大误。检历史年表,明代成化间并无“庚辰”年。应是“甲辰”年(成化二十年,1484)的抄写之误。明人史料有三:

其一,《世宗实录》卷269“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丁丑”条记为:“致仕南京工部尚书陈雍卒。雍浙江余姚人,成化甲辰进士。授工部主事。”^⑱

其二,明人孙矿《南京工部尚书简庵陈公雍墓志铭》文云:“公登成化甲辰进士。弘治改元授工部主事。”^⑲

其三,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51“南京工部尚书表”录作:

“陈雍,浙江余姚人,成化甲辰进士,嘉靖四年任,六年致仕。”^②

再见内证史料。《国榷》卷首之四“南京工部尚书表”载“余姚陈雍,成化甲辰进士。四月任,六月勒免。”^③证同书“成化庚辰进士”必误无疑。

(三)名字错谬,同人两名

考谈迁编写《国榷》的有关史料,常言其以《明实录》和官方邸报为主,参考明人著作,据吴晗统计,有叶子奇、沈德符、陈子龙等120多人的各种文献资料,但未见谈氏利用明代进士题名碑的资料和地方省、府州县的方志史料的相关记载。笔者以为,记述进士人名,明代官方在京城碑刻和进士本人家乡的方志资料具有重大价值,故笔者订正《国榷》中进士人名的讹误,主要利用了《明实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焦竑《献征录》和有关地方省志的史料。考《国榷》进士人名谬误,主要原因有两种情况:第一汉字字形的形近易误,例如“季”姓与“李”姓、“徐”姓与“涂”姓,在人名中,“待”字与“得”字、“斌”字与“武”字等,多易抄写互误。第二是抄写中的脱字与衍字,古代抄书者,苦于《国榷》五百万字的大作,故抄写疲劳、偷工减料,导致进士人名的脱字衍字,也是常见之事。

(1)进士原俊为南京监察御史^④。

案:上文进士人名应是“原傑”非“原俊”。其证有:

其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原姓明代进士人名中无“原俊”,仅有:“原傑,山西阳城人,正统10/3/54”。^⑤

其二,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1“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表中有文云“原傑,山西阳城人,由进士,(成化)九年任左,十二年巡视荆襄”。^⑥

其三,《明史·原傑传》文称:“原傑,字子英,阳城人,正统十年进士……擢江西按察使……迁山东左布政使……会南京兵部缺尚书,以傑任之。”^⑦

其四,明无名氏《南京兵部尚书原傑传》文云:“原傑,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乙丑进士(即正统十年,1445),授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有能声,超擢江西按察史,升山东左布政使。”^{②6}

(2)南京刑部右侍郎魏绅卒,宜春人,成化乙未进士。^{②7}

案:进士人名有误,应为“郭绅”。史料如下:

其一,《武宗实录》卷102“正德八年七月癸巳”云:“南京刑部右侍郎郭绅卒,绅字延章,江西宜春人,成化乙未进士,升太仆寺卿、贵州参政、福建布政使。正德庚午为南京太仆寺卿,寻转大理寺。”^{②8}

其二,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58“南京刑部左右侍郎表”中有“郭绅,江西宜春人,由进士,七年任右,八年致仕。”^{②9}

其三,明焦竑《献征录》卷49“南京刑部右侍郎郭公绅传”云:“郭绅,字廷章,江西宜春人,成化乙未进士,授浙江宁海县知县,以治行,荐召入监察御史。”^{③0}

其四,《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郭绅,江西宜春人,成化11/3/112”。^{③1}成化十一年,即乙未年(1475)。

关于“魏绅”其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为:“魏绅,山东曲阜人,成化17/2/15”。^{③2}成化十七年为辛丑年(1481)。此人与《国榷》上文的“魏绅”籍贯与考中进士的时间根本不同,故非为一人,所以《国榷》上文进士人名“魏绅”应是“郭绅”之抄误。

(四)任官讹书,为官不实

《国榷》中记进士官员,大多在此人去世之时,返记其中举时间,初入仕后授任何官,或者转为何职的生事。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调任频繁,异地任职,流动为官,辗转迁谪,故其任官职亦易误书。其情况分两种:第一是记载初为官职误,进士入仕后的初任官职,在《明实录》中、个人墓志铭、个人传记中均有记录。然谈氏以一个人的精力,理500万字的文稿,难免有讹谬之时;再者,谈氏初稿本

准确,到了抄书人手中,也会转抄致误。第二是历任官职误,依明代官制,进士官员升迁,或因军功,或得人宠,或是政绩显赫,均可升职。另,为避结党营私之嫌疑,进士官员往往在外省为官,流动迁转颇多,这就使得个人传记中职官名衔众多,在谈氏摘录明人著作或他人转抄过程中,也会产生讹误。

(1)前兵部尚书孙原贞卒,德兴人,永乐乙未进士,授兵部主事。^③

案:上文称进士孙原贞初任官为“兵部主事”不确切。应是“礼部主事”。其证有:《宪宗实录》卷135“成化十年十一月乙亥”作:“致仕兵部尚书孙原贞卒,原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兴县人,举永乐乙未进士,授礼部主事。”又,《明史·孙原贞传》云:“孙原贞,名瑀,以字行,德兴人,永乐十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④

(2)前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倬卒,倬字用检,太仓人。成化戊戌进士……改琼崖兵备,进广西按察使。^⑤

案:上文称王倬曾任“广西按察使”一职误。其证如下:

其一,《武宗实录》卷160“正德十三年三月戊辰”为:“改广东琼州兵备,进云南按察使,转广西右布政。”

其二,明王鏊《通议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倬神道碑》文云,王倬:“成化戊戌登进士,出知山阴县……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广东琼州兵备……论者以为奇功,公不以闻,进云南按察使。”^⑥

(五)籍贯、家乡异载

《国榷》记进士官员,常记其为何方人士,籍贯祖地,其荒谬之处也见文字之间。考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其一为汉字的形体相近,易成误字。如进士胡尧臣本为四川安居人,而《国榷》书为“安岳人”,“居”字与“岳”字相近。其二是抄写错误,如进士汪文盛的籍贯,在《世宗实录》中记为“湖广崇阳人”,而在《国榷》中,误抄作“枣阳人”。总之,《国榷》中进士官员的籍贯记误往往是一个字之差,如“丰城”与“通城”,“安居”与“安岳”之类。

(1)前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枣阳人,正德辛未进士。自饶州推官,历任兵部员外郎。^⑳

案:上文记汪文盛进士的籍贯误,非为枣阳人,抄写误,应作“崇阳人”。明人史料有:

其一,明廖道南撰《汪文盛传》文云:“汪文盛,字希周,崇阳人。”“授饶州府推官”。^㉑

其二,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0“大理寺卿表”:“汪文盛,湖广崇阳人,由进士,二十年召改,未任致仕。”^㉒

其三,《世宗实录》卷274“嘉靖二十二年五月戊辰”条:“致仕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湖广崇阳人,正德辛未进士,授饶州府推官。”^㉓

(2)前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胡尧臣卒,尧臣字□□,安岳人。嘉靖□□进士。^㉔

案:上文将胡尧臣进士的籍贯抄误,当是“安居人”。《神宗实录》卷116“万历九年九月乙酉”作“尧臣,四川安居人”^㉕。又,清黄廷桂《四川通志》卷35“明嘉靖戊戌科进士表”中有“胡尧臣,安居县人,历都御史”。《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胡尧臣,四川安居县人,嘉靖 17 / 3 / 129 ”^㉖。另,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31明代“巡抚都御史表”云:“胡尧臣,四川安居人,进士。”

二、《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之原因

《国榷》所书明代进士史料,有人名之讹,籍贯之误,职官之谬。其原因多方,但以笔误居多。考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二:

第一,《国榷》手抄本杂乱,导致现刊本谬误繁多。谈氏《国榷》脱稿之后,并无完本流行。在中华书局1958年刊印之前,据明史专家吴晗云,在30年代只有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㉗,而这部书以后不知其下落。1958年中华书局印行《国榷》时,所依据的手抄本,是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

卢氏“抱经楼”抄本互相校补而综合的稿本。关于《国榷》的手抄本,浙江海宁张宗祥在《国榷》“题记”中对国内所存抄本的杂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1925年阅读过蒋氏“衍芬草堂”《国榷》83册手抄本后,叹息:“深憾缺简过多”,其中以“正德、嘉靖、万历三朝为甚”。这83册手抄本“所载大事,或有始无终”^⑤。此后,张氏又在南京江南图书馆看另一本《国榷》手抄本,认为也存在大量缺遗之误。

1958年采用的蒋氏和卢氏手抄本,其本身就有很多缺误、遗漏。《国榷》现刊本校印人张宗祥在“题记”中举例说:“卢蒋二书,各有优劣。或蒋缺而卢全。如正德之俘宸濠,嘉靖之诛陈东。万历之抄江陵,蒋本均不全”。“或蒋全而卢缺,如崇祯十七年五月至八月各条,卢本均缺。”“亦有两本均缺者,如成化十三年十月;有蒋本缺,卢本虽有而仍不全者,如万历六年七八两月,二本均缺者”。

第二,谈氏所据《明实录》,未见全书整貌,亦是造成现刊本《国榷》中进士史料讹误的原因之一。

《明实录》是谈氏撰写《国榷》的主要史料。这在谈迁《北游录》中多次提到。例如,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在他的《北游录》日记中,三月乙未、五月丙午、十一月癸卯、十二月辛未等许多天的时间里,都在向朋人寻找《明实录》中的抄本。其中三月乙未日记文云:“过霍大理,问先朝实录,未至也。”五月丙午又记:“过少司马霍鲁斋所,问先朝实录,在南道未至也。”十二月辛未再记:“借霍鲁斋《万历实录》。”清人朱彝尊也称谈迁:“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当代明史专家吴晗亦撰文云,谈迁写《国榷》的主要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⑥。《明实录》是明末清初许多历史学家研究明史的主要资料。例如,清初史学家万斯同,“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

增饰者也”^⑦。但是当我们认真考核一下,在30年代以前,《明实录》并无正规的刊印本,均系手抄本。吴晗在1934年前后在北京图书馆看《明实录》时就指出,明代被指定抄写《实录》的人,惧怕该书部头大,字数繁多,故“任间偷懒,少抄或漏抄以至错抄的地方很多,错字脱简,到处都是。”此外,《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天启实录》等,均遭到皇帝和大臣的部分篡改或毁灭。正因为谈迁在清初看不到《明实录》的完整抄本,所以他在顺治十一、十二两年到北京居住时,才努力寻找较好的《实录》抄本。

第三,在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谈氏虽有重要收获,但也存在资料收集上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从政治社会地位分析,谈氏在京城接触的明代遗臣、上层贵族、官府大臣人数并不广泛。据谈氏《北游录》的记载,主要有浙江秀水人曹溶、太仓人吴伟、武功人霍达。他本人也不得不称:“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因为他是于1653年跟随浙江义乌人朱之锡到北京当朱氏的幕僚,并不是有地位、名望的大官。在与不熟悉的北京人交往中,谈迁自己感到:“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幕僚,要上门拜访达官贵人,想必是十分困难的。在《北游录》中有文可证,顺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癸丑“往崇文门访严氏,问以遗事,不值。”十二月辛未“借曹通政《续文献通考》,不值”。他自己写道在民间访问“稍非其人,则不敬置哆”。

其二,从经济上分析,谈氏在京城借书和买书都十分艰难。他自叹道:“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而如果要去买书,则又是贫寒无力。“市书则余囊耻,日攒眉故纸,非其好也”。自己无钱购买,则靠朋人帮助,如顺治十二年(1655)十二月辛未《北游录》文记“借霍鲁斋《万历实录》。向在嘉善钱相国所抄实录,为全书删其半,至是鲁斋以二百金购置”。

其三,从生活习惯上分析,一个南方人到了京城,也感到人生地不熟,气候不适。在偌大一个京城,谈氏曾外出访问,有迷路而归的日子。例如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乙巳:“早至宣武门直舍,盖溧阳之杜邮也,失导而返。”在气候方面,谈氏不习惯北京的沙尘飞扬。他自云京城内是“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于是常常思念回归浙江故乡。他说:“余欲归屡矣!”这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谈氏在京城调查访问以及对《国榷》一书文稿的订正工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谈氏于1656年初回到浙江海宁^⑧。短暂的北京之行,收获不少,但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困难,也束缚了他对《国榷》材料的收集和订误工作。因此,在《国榷》中有少数讹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国榷》不失为一部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不能因书中的少量抄写遗漏之误而有损它的价值。同时,谈迁三十多年辛勤笔耕,不辞艰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人们学习和弘扬。

注:

①《国榷》卷64,页3996,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己卯条。中华书局,1958年。

②《国榷》卷64,页4035,嘉靖四十五十一月庚申条。

③(明)焦竑:《献征录》卷39,册2,页1627。上海书店,1987年。

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02,册18,页5336。中华书局,1974年。

⑤(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页779。中华书局,1985年。

⑥《国榷》卷71,页4370,万历八年七月甲午条。

⑦《国榷》卷71,页4383,万历九年二月申寅条。

⑧《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册1,页4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⑨同⑧,页519。

⑩同④,卷221,册19,页5813。

⑪《国榷》卷48,页3011,正德六年十月壬辰条。

⑫《明实录》册 35, 页 1738。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1962 年。

⑬同③, 卷 44, 册 2, 页 1844。

⑭同⑤, 册 2, 页 948。

⑮同⑧, 页 2250。

⑯《国榷》卷首, 页 182。

⑰《国榷》卷 57, 页 3636, 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丁丑条。

⑱同⑫, 册 44, 页 5301。

⑲同③, 卷 52, 册 2, 页 2214。

⑳同⑤, 册 3, 页 970。

㉑《国榷》页 206。

㉒《国榷》卷 26, 页 1722, 正统十二年闰四月壬午条。

㉓同⑧, 下册, 页 1933。

㉔同⑤, 页 1148。

㉕同④, 卷 159, 册 14, 页 4343。

㉖同③, 卷 42, 册 2, 页 1728。

㉗《国榷》卷 49, 页 3049, 正德八年七月癸巳条。

㉘同⑫, 册 35, 页 2118。

㉙同⑤, 册 3, 页 1095。

㉚同③, 册 2, 页 2059。

㉛同⑧, 上册, 页 140。

㉜同⑧, 上册, 页 809。

㉝《国榷》卷 37, 页 2348, 成化十年十一月乙亥条。

㉞同④, 卷 172, 册 15, 页 4585。

㉟《国榷》卷 50, 页 3149, 正德十三年三月戊辰条。

㊱同③, 卷 43, 册 2, 页 1794。

㊲《国榷》卷 58, 页 3644,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戊辰条。

㊳同③, 卷 68, 册 2, 页 2971。

㊴同⑤, 册 3, 页 1129。

㊵同⑫, 册 44, 页 5381。

㊶《国榷》卷 71, 页 4395, 万历九年九月乙酉条。

本刊“百期总目及索引”现已出版

《文献》杂志创办于 1979 年,至今出版已逾百期。百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有丰厚学术含量的论文,本编辑部特制作增刊“百期总目及索引”,以飨读者,以志纪念。其中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百期汇目,插图目录逐期随之,第二部分篇目分类索引,第三部分插图分类索引。第四部分作者索引。力图以不同的检索方式,方便读者查询百期以来《文献》所刊登的论著。

该“百期总目及索引”现已出版,三十二开,定价:15.00 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部销售。门市部电话:010-66126156。

⑫同⑫,册 53,页 2196。

⑬同⑧,中册,页 1739。

⑭吴晗:《谈迁与国榷》,《国榷》册 1,页 2。

⑮张宗祥:《题记》,见《国榷》册 1,页 2。

⑯吴晗:《谈迁与国榷》,《国榷》册 1,页 4。

⑰(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 12“万季野先生墓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册 1420,页 446。

⑱以上有关谈迁《北游录》的原文,均转引自吴晗《谈迁与国榷》一文。见《国榷》册 1,页 1-66。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温州大学北校区教育科学学院